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河北师院函授部

目 录

鲁迅生平简介	(1)
阿Q正传	鲁 迅 (7)
祝 福	鲁 迅 (21)
藤野先生	鲁 迅 (31)
自 嘲	鲁 迅 (40)
无 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	鲁 迅 (46)
郭沫若生平简介	(51)
凤凰涅槃	郭沫若 (55)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 (76)
发 现	闻一多 (83)
静 夜	闻一多 (87)
春 蚕	茅 盾 (93)
白杨礼赞	茅 盾 (103)
在烈日暴雨下	老 舍 (107)
清 贫	方志敏 (116)
包身工	夏 衍 (123)
白毛女	贺敬之等 (123)
荷花淀	孙 犁 (144)
党 费	王愿坚 (153)

新结识的伙伴·····	王文石	(160)
依依惜别的深情·····	魏 巍	(168)
长江三日·····	刘白羽	(173)
雪 浪 花·····	杨 朔	(179)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185)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194)
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石 祥	(197)

鲁迅生平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他母亲姓鲁）。浙江绍兴人，生于一个逐渐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家里原有四五十亩水田，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祖父周介孚（清朝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因科举考试作弊案下狱，父亲周伯宜（读书人）病故，于是家庭经济急剧下降，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家庭的破落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的炎凉，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鲁迅幼年常去农村外祖父家，和农民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了解了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这一切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生活道路有积极影响。

鲁迅从六七岁起进私塾，除读规定的经书外，还喜读“野史”、“笔记”和“小说”，爱好民间故事、传说和绘画。一八九八年离家到南京求学，接触了当时所谓“新学”，即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

一九〇二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留学。他从祖国需要出发，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为了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于一九〇四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他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杀头，痛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即国民）的精神的，文艺正是改变人们精神的利器，于是毅然弃医学文。一九〇六年，他由仙台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介绍当时世界上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推崇富有反抗性的摩罗诗人，提倡造反精神。他翻译并介绍外国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编入《域外小说集》。一九〇八年从革命家章太炎听讲《说文解字》，并参加了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光复会”。

一九〇九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他曾兴奋地带领学生上街宣传革命，但不久，便失望了。他目睹政权虽然换了旗号，但“内骨子是依旧的”。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到南京，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五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后升为佥事。这期间，他见到袁世凯称帝、张勳复辟，感到愤慨和苦闷，一面整理古籍，研究中国历史，一面继续探索中国前途问题。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鲁迅受到极大鼓舞，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一扫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寂寞和苦闷，积极英勇地投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一月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四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清醒的反抗封建主义思想、被封建势力迫害的狂人形象。通过狂人的所想、所见、所感，彻底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的本质，号召人民来推翻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旧社会。它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响亮的春雷，是讨伐孔孟之道、彻底捣毁沿袭

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宣战书。自此以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反帝反封建的小说和论文，并创造了尖锐锋利的杂文形式，同封建遗老遗少、尊孔复古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痛斥他们是“现在的屠杀者”。在一九一九年写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热烈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们要向那曙光抬起头来，迎着那曙光走去。

一九二〇年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密切联系广大进步青年，编定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一九二一年，鲁迅发表了著名小说《阿Q正传》，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精神胜利法”对雇农阿Q的毒害，提出了农民和革命的关系这一深刻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作。一九二三年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共收作品十四篇。《呐喊》反映了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不朽的农民典型、也塑造了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的形象，也鞭鞑了一些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逐渐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虽有“荷戟独彷徨”的情绪，但他仍以韧的战斗精神坚持同“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做斗争。一九二五年主编《莽原》，支持和领导《语丝》出版，排击各种反动思想。同年，围绕“女师大风潮”，鲁迅同北洋军阀及其走狗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给予青年以支持和鼓舞。一九二六年一月，发表了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了“打落水狗”的战斗原则。“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无比愤慨，控诉

了帝国主义者及北洋军阀血腥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揭露了反动文人“替暴君奔走”的卑劣行径。这时期写了小说集《彷徨》、大量杂文和散文诗《野草》。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因受反动军阀、政客的迫害，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和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五篇。

一九二七年初，鲁迅赴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共产党人有了亲密交往，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在广州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鲁迅对此万分愤慨，因多方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以示抗议，并不顾个人安危写了许多抨击蒋介石的杂文，收入《而已集》。在反革命大屠杀中，鲁迅亲眼看到“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引起思想上的剧烈震动，“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思想“轰毁”了逐步由进化论走到阶级论。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光辉战斗。

鲁迅到上海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加刻苦。在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指导斗争。鲁迅在长期阶级斗争实践、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以革命的硬骨头精神，领导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他主编由北京迁来的《语丝》，和郁达夫创办《奔流》，还和青年作家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出

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倡导新兴的木刻艺术，主编《萌芽月刊》《前哨》《译文》等革命刊物，培养了很多革命作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从一九二八年起，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梁实秋等为头子的“新月派”，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马前卒，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猖狂进攻。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彻底批判了他们鼓吹的“人性论”，揭露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丑恶嘴脸。在和“新月派”的斗争中，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了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一九三〇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革命作家组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参加领导工作。他还带领左翼作家同国民党的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派”和标榜超阶级的“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一败涂地。国民党知道走狗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文学，于是采用屠杀革命作家、查禁书报、捣毁、封闭书店等法西斯手段，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镇压，甚至下令通缉鲁迅。而鲁迅胸怀真理，不畏强暴。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秘密杀害柔石等革命作家，鲁迅怒向刀丛，用笔向国内外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又暗杀了爱国人士杨铨，鲁迅义愤填膺，明知自己也有被特务杀害的危险，毅然参加了杨铨的葬礼，并且出门不带钥匙，表示视死如归的决心。他大义凛然地表示：“只要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鲁迅英勇地冲破文网，巧妙地更换笔名（他一生用了一百三十多个笔名），运用各种不同的笔法连续发表匕首、投枪式的战斗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鲁迅先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跟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痛斥了他们掀起的“尊孔读经”的逆流。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托派对党、对毛主席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恶毒攻击，揭露了他们的汉奸卖国贼的反革命嘴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他和茅盾联名给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表达了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六岁。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近一千万字的著作和译作，收入《鲁迅全集》二十卷。他的著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已译成五十多种文字。鲁迅是世界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文学，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忘我地工作，直到逝世前的一天，还在执笔，坚持到最后一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集中概括了鲁迅一生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给鲁迅以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阿Q正传》分析

—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写于一九二一年底。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著。它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广泛流传，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非常珍视《阿Q正传》，称赞它是一篇好小说。

这篇小说是以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奴性十足；一面又念念不忘“三千余年古国古”的荣耀，幻想用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战胜帝国主义炮舰政策。对内，在经济上、政治上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在思想上更加宣扬孔孟之道，强化愚民政策，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吓不倒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自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年，中国人民自发地进行了近千次的反清起义，一九一一年，在孙中山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一大创举。

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政权很快落到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走了回头路，赶走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特点，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鲁迅对辛亥革命曾寄予殷切期待，并为它积极奋斗过，因此对它的失败极感痛心，也使他进一步认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他在长时间的思索之后，看出了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正是革命党人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使他们敌我不分；严重地脱离群众和群众的愚昧不觉悟，又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群众支持，以战胜本来十分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反扑。鲁迅在“新世纪的曙光”——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下，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用全新的眼光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为了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为了唤醒群众，砸碎旧的精神枷锁，起来进行新的革命，鲁迅写下了《阿Q正传》这篇不朽的的名著。

二

这篇小说以主人公阿Q的“行状”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全篇共九章，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 序），主要交代给阿Q作传的缘

由，说明阿Q处于被剥削、奴役和凌辱的奴隶地位；讽刺了封建文人为帝王将相立传的正统观念，批判了孔丘的“正名”说。

第二部分（包括二、三章），通过典型事例，描写了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压迫，受欺凌，既无法反抗，又不甘屈服，只好在精神上自慰自解，用来获取优胜。所谓“优胜记略”，实际上是阿Q饱受压迫和损害的血泪记录。

以上两部分是故事情节展开前的总的介绍。介绍了阿Q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身世、性格的基本特征，提出构成故事情节的主要矛盾。

第三部分（包括四、五、六章），主要写阿Q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是故事情节的发展。

第四部分（包括七、八、九章），主要写阿Q在革命中的遭遇和悲惨结局。第七章写阿Q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开始朦胧觉醒，“神往”革命。这是阿Q性格发展的转折点。第八章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揭示了阿Q做不成革命党的社会原因。第九章是小说的高潮，写阿Q被地主资产阶级诬陷为“抢犯”，被捕、被关和被杀的悲惨结局。

阿Q是小说的主人公，对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分析，过去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阿Q是中国人精神方面各种毛病的综合”，即“国民劣根性”的典型；有的把阿Q这个典型看成一个集合体；有的把阿Q完全看成是辛亥革命时代革命农民的典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阿Q正传》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这一论断澄清了各种错误观点。

阿Q是辛亥革命时代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精

神上受戕害的一个流浪雇农。他生活在封建势力统治极严的一个闭塞的农村——未庄。他没有家，也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无亲无故，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土谷祠里，一贫如洗。他虽整日给人当牛做马，仍然维持不住最低的生活。他在未庄的社会地位最低下，连说姓什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赵太爷姓赵，就不准他姓赵，当他说自己姓赵时，不仅遭到赵太爷的辱骂和打耳光，还受地保的训斥，被敲去二百文酒钱。赵太爷是快添孙子的人，讨小老婆是天经地义；而年已三十的阿Q向吴妈求爱，却认为是非法的，被赵秀才用大竹杠迎头打来。毒打不算，还要强迫阿Q订了“五个条件”，把阿Q剥夺得只剩下一条万不能脱下的裤子。盘踞在未庄的封建势力对阿Q的剥削和摧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阿Q具有勤劳、朴实的农民阶级的本色。他很会劳动，“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真能做。他即使在押牌宝赌输后，仍不忘肿着眼睛去做工。他朴实，因为生活所迫，到城里做了短时间的小偷，对于不能上墙，不能进洞，只站在外边接东西的事，坦然地说给别人听。他无辜被关进大牢，爽快地对人说因为“我要造反”。这些都表现了他朴实的性格。

阿Q还具有反抗意识和朦胧的革命要求。他对如虎似狼的地主有本能的厌恶，所以对大受居民尊敬的赵太爷，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敬。他对赵、钱两家的“文童”，表现了“不值一笑的神情”。他从心眼里鄙视和仇视假洋鬼子，骂他是“秃儿，驴……”，嘲笑他的黄漆棍子是“哭丧棒”，痛斥他是“里通外国的人”。列宁说：“多少世纪以来 劳动人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

心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九十页），在阿Q的心底里养成的这种心理，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所决定的。

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的毒害下，起初阿Q曾经错误地“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革命的风声传来时，他看到城里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要到乡下逃难，不禁对革命有些“神往”了。特别是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神情”，更是“快意”。他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他在高兴之余，不禁大声喊到：“造反了！造反了！”这是从他心底迸发出来的心声，是发自被压迫阶级的本能的内心要求。阿Q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尽了凶恶残暴的赵太爷之流的欺凌。“太可恶！太可恨！”吐出了郁结在阿Q内心深处的怨恨。他直觉地意识到革命对他这样生活濒于绝境的人似乎有利，于是冲破了革命党就是“造反”的正统思想的束缚，激起了复仇的心理和翻身的激情。他扬眉吐气地在街上走着唱着，高兴地喊道：“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很神气。骑在他头上的赵太爷怯怯地称他“老Q”；赵白眼也表示对他敬畏，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的思想性格随着革命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他幻想有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叫道：“阿Q！同去同去！”未庄的鸟男女跪下叫道：“阿Q，饶命。”他想“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对革命充满了幻想。从一向深恶“造反”到向往革命和要做革命党，这一切是符合阿Q的性格的发展的，是符合他贫雇农的阶级本质的。尽管阿Q没有真正了解革命的目的和对象，对革命存在许多糊涂观念，以为革命就是报私仇，抢点

东西，找个老婆，成家立业，想法和行动都很幼稚可笑，但他要造赵太爷的反，改变自己非人生活境遇的要求，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要求。列宁指出：“农民有更加自觉的革命性，他们急切地立刻打垮地主政权，立刻创立新制度。农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恨不得马上扑到敌人身上，把敌人扼死”。（《列宁选集》第十三卷第三七七页）鲁迅在《〈阿Q正传〉成因》一文中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这就说明了阿Q和革命的关系及其要参加革命的必然性。当然，阿Q的自发革命性是通过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只能是阿Q式的革命，不是完全意义的革命，鲁迅对他复仇、成亲、安家的幻想是持批判态度的。

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醒的农民。由于他处于受凌辱而又无力反抗的地位，加之他深受孔孟思想的毒害，因此形成了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突出特征：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他的盲目自尊自负、自轻自贱、畏强凌弱，以及健忘、麻木等。

阿Q经常受压榨、欺凌和损害，但在精神上却自慰、自宽、自解，常处优胜。他盲目地自尊自负，把未庄的居民全不放在眼里，也瞧不起城里人。他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可是和别人口角时，却夸耀过去的荣耀，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头上有癞疮疤，为了维护尊严，不但怕别人提到，连光、亮、灯之类的字眼都要避讳。谁要犯了讳，他气得全疤通红，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然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地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等新的方针不能取胜，又想出提高自己的政策，说：“你还不配……”，

于是转败为胜，好象癞头疮也就成了他头上特有的一种高尚的光荣的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闲人打了他，心满意足的走了，他用自我麻醉的方法，说什么“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了。这虽是他不甘屈辱的表现，但实际却是他在败退时用来掩盖自己软弱的借口，用自欺自慰的方法掩盖自己的被损害被侮辱。这样也就容易由盲目自尊转为自轻自贱。当闲人们知道他的精神胜利法后，在抓住他的黄辫子时，总是逼着他说：“人打畜生”，他竟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闲人们碰了他几个响头，然后得意的走了。可是阿Q并不以为失败，“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于是他又心满意足了。一次，他赌博赢了一堆洋钱却又被人夺走了，还挨了打，他这回才感到失败的苦痛，但立刻转败为胜，用力打自己的嘴巴，仿佛打的是别一个自己，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但这种“胜利”，实际上是想用虚伪的优胜来解除耻辱和痛苦，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阿Q解除屈辱的另一个法宝是“健忘”。他向吴妈求爱，挨了赵秀才的大竹杠，没过一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马上到赵府内院看“热闹”了。这种惊人的健忘，使他记不住自己的屈辱和仇恨，永远居于奴隶地位。他骂假洋鬼子，看见“哭丧棒”打来，并不反抗，而是赶紧抽筋骨，耸耸肩膀等候着。等“啪！啪啪！”打完之后，倒觉得“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早已忘却了。当被假洋鬼子欺侮和被王胡打败后，又转向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以博得酒店里闲人的开心，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

仇。他不敢正视现实，终日浑浑噩噩，直到被杀前画押时，还恐怕别人笑话他画不圆圆圈，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游行示众时，他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给吴妈唱几句戏。他的麻木不觉悟达到多么可悲的程度啊！

以上阿Q精神胜利法的几个方面，反映了阿Q不甘屈辱、受压迫的心理，说明了这种胜利法是阿Q用来反抗现实压迫的手段，是自我麻醉的一帖麻醉剂，是阻碍摆脱奴隶命运的精神镣铐。它丝毫不能改变受压迫受屈辱的地位，只能模糊和忘却受屈辱受压迫的残酷现实，只能使人“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

阿Q身上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绝不是农民阶级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反动统治阶级用孔孟思想毒害的结果，本质上是属于反动、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范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一方面受到每一时代先进力量的反对，另一方面又牢固地统治着每一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农民本身的弱点，一些人容易接受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条件。阿Q的思想“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例如正统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观念，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封建思想，“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宿命论，无一不是孔孟思想毒害的产物。

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打着时代的烙印，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在统治阶级中间非常普遍的。清朝统治者原来闭关自守，自称“天朝”，自尊自负，称外国人为夷狄。等到帝国主义侵入，屡遭挫败，则又逆来顺受，自轻自贱，一面奴颜婢膝的屈辱求和；一面又